

朝合理薪金制的方向迈进

我国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近年来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关注，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般国人的实质工资预计将减少，入息不高的低薪工人将面对更大的困境，但我们看到政府相关部门和职总已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低薪工人的收入。

要收缩贫富者之间差距，降低或冻结高收入者的薪酬不是解决之道，唯有设法提高低收入者的入息，我们选择了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低薪者的收入，虽只是解决问题的一小步，但却是踏出了第一步。

今年5月，工资理事会建议雇主为月入不超过1000元的工人加薪至少50元，以改善低薪工人工资一直停滞不前的处境；数天后，职总平价合作社立即宣布响应号召，让月薪低于1000元的收银员和零售助理等非执行级员工享有140元的加薪。

虽然薪金调整将使得职总平价超市每年的人力

成本增加超过1000万元，但获益的700名低薪员工取得了实质工资增长，作为我国最大雇主之一的职总平价作了正确的示范，鼓励业绩好的企业给予员工合理的工资增长，尤其是低薪员工。

一个星期前，卫生部宣布在疗养院、社区医院等为病人提供中长期医疗机构服务的人员，将获得10%到24%的加薪，这些非医疗人员包括行政、厨师、司机、清洁工和保安支援人员，估计有超过3500人受惠。

在上星期宣布的清洁标志认证计划下，有意在明年4月1日承包政府新合同的清洁公司，一定要先取得清洁标志认证，而要获得认证资格就必须确保公司清洁工的底薪至少1000元。

这一系列的加薪行动，是我国迈向合理工资制方向的重要一步，政府积极带头推动建立合理的薪

社论

2012年10月26日

金制度，对低薪员工的薪水进行检讨，同时找出更好的作业方式提高生产力，甚至重新规划工作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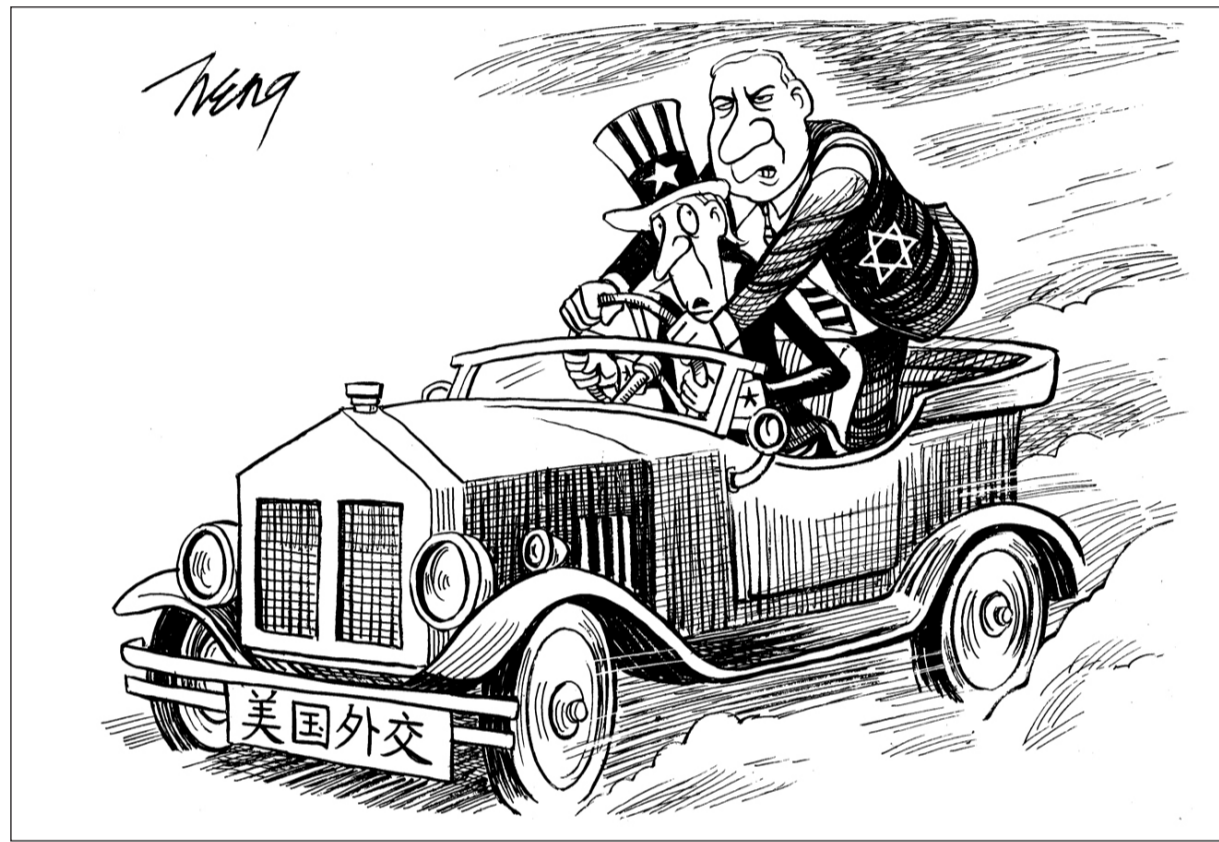
我国经济学家林崇椰教授今年4月提出以休克疗法进行“第二次经济重组”，建议在三年内将低收入者的工资提高50%，他昨天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就这点也有进一步的论述。对于他大胆提出大幅度给低薪工人加薪的建议，劳资政三方虽然不以为然，但林崇椰教授的建议的确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震撼作用，也引起广泛讨论，大家开始关注在经济快速发展下社会中被忽略一群。

目前大家的共识是须为月入不超过1000元的工友加薪，但不是制订最低薪金制，最低薪金制涵盖的范围明显存在不合理的因素，以新加坡来说，实施最低薪金制还必须考虑到涵盖外劳可能引起的负面经济效应等，目前我国的外籍劳工人数达130

万名。那些最低薪水还无法达到1000元的工人的处境，今后相信会继续受到重视，全国工资理事会也会在将来继续建议给低薪工友加薪。

要提高低薪工人的收入，劳资政三方必须同时加强员工的技能和提高生产力，只是单方面强调必须为工友加薪，而不管技能和生产力是否提高，这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成本增加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滑，更何况我国的生产力目前仍是负增长，因此薪金调整必须考虑到雇主、员工和公司的条件和需要。劳资政三方最近提出为清洁工设定至少1000元渐进式基本薪金的建议，基本是为未来低薪工人的薪资福利设定基调。我们在关心低薪工人的处境时，必须留意企业人力成本支出的增幅，不能扼杀了企业的生存能力，否则低薪工友会在公司与员工之间工资平衡的矛盾之中失去饭碗。



特约漫画 王锦松

热点话题 史蒂文·罗奇

不择手段诋毁中国

除非美国面对自身长期厌恶储蓄的问题——也就是说，大规模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鼓励重建早已严重枯竭的家庭储蓄——否则多边贸易逆差将持续下去。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尾声，相关辩论似乎也失去焦点。对中国的纠缠不清是最好的证明——现任总统奥巴马及其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都争相把中国当靶子，指中国是美国工人及其家庭所面对压力的主要来源。两人在大选辩论中强调：只要对中国强硬，美国人的痛苦自会有所减轻。

这完全是符合事实的。看看下面的这些指控。

货币操纵：自中国于2005年7月实施汇率调控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32%，经通胀调整后对一揽子货币也升值了约30%。这些不是微不足道的数目，而且未来数年人民币预计还将继续升值。

跟1985年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日元大幅升值（“广场协议”）的日本不同，中国人选择渐进与审慎地行事。美国官员把这称为“操纵”，认为市场力量本应使人民币有更大幅度的升值。中国人则专注于维护稳定——这是美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不能理解的概念——也因此坚持在调整自身币值上扮演更积极角色。我把这称为谨慎——或甚至是明智。在“失去20年”后，日本这个实验品或许会知道哪种方式更加合适。

业务外包和知识产权：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最近稍有起色，美国的就业情况依然糟糕。私人部门的就业人数依然比2008年1月的高峰期少了410万。

但这根本不足以证明两党关于当前危机源于美国制造业职位外包给中国的指责。制造业占私人部门就业的比例，虽然从2008年1月的11.9%跌到2012年9月的10.7%，但这只是自1970年代初便已开始的长期大幅下滑趋势中的一小部分——当时制造业占私人部门就业

的比例可是超过30%。相比于中国来说，需求疲软——尤其是消费者支出增长在危机后的暴跌——是最近雇佣需求下滑的更大罪魁祸首。

而中国则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出力者——它既是一个多国供应链生产产品的组装中心，又是囊中羞涩的西方跨国企业的高效离岸解决方案。约50%的中国出口是先在其他经济体进行加工，而近60%的产品都是由“外资企业”的中国子公司运出国的。

这些趋势在令中国工人受益的同时，还造福了美国及其他国家；既帮助压低它们的通胀，也使它们的企业得以应对严酷的竞争风险。此外，这也阻止了那些西方创新企业将知识产权和新技术冒险投放在中国的生产线上，来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令人赞叹的新产品（比如苹果公司）。

抨击中国是愚蠢行为

贸易逆差：没错，美国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2011年约为295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7380亿美元商品贸易总缺口的40%。共和党两党都坚持这是美国就业问题的关键。毕竟，贸易逆差意味着职位流失。

由于美国贸易缺口的最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个被诋毁为操纵货币的骗子，双边贸易逆差因此成了抨击中国者的最好理由。这正是奥巴马最近就世界贸易组织内的争执与中国唇枪舌战，并限制中国投资俄冈州风力发电厂背后的原因；也是罗姆尼在货币操纵和贸易制裁等方面大肆叫嚣的原因。

但两个候选人都承认更大的症结所在。美国在2011年与98个国家有贸易逆差。与其他97个国家的逆差并未凭空消失。它们都是源自

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储蓄下滑——经过贬值调整的“国民净储蓄率”（结合企业，家庭和政府）自2008年来一直为负值——所导致的大规模多边贸易逆差的一部分。缺少储蓄却期望增长，美国唯有在巨额经常账户和多边贸易逆差下运作，以便进口其他国家的多余储蓄。

这正是为什么抨击中国是愚蠢行为的原因。历史上，没有一个领先全球的国家一直维持着负储蓄率。贸易逆差——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是美国为其肆意挥霍所付出的部分代价。

除非美国面对自身长期厌恶储蓄的问题——也就是说，大规模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鼓励重建早已严重枯竭的家庭储蓄——否则多边贸易逆差将持续下去。简单的算数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多边问题是不能用双边方案来解决的。

政治人物都喜欢简明有力的信息。但那些信息往往言过其实。众多美国家庭正在受害，而选举产生的官员则希望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并以此转移民众对重建储蓄、恢复竞争力及量入为出等艰巨工作的注意力上。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公众被针对中国的错误指控愚弄了。

幸运的，是竞选正接近尾声。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是接下来要怎么做。那些诋毁中国的人一般都会在总统选举之后调转头。但在11月6日后，美国家庭头上的压力可不会消失。

奥巴马和罗姆尼都面临着在中国问题上自断后路的风险。这可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向一个深渊。在还有时间挽回前，美国领导人必须向人民坦白。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下一个亚洲》
英文原稿：A New Low for China Bashing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2

时事透视 储昭敏

美国外交面临被绑架之困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0月15日表示，她对上月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的美领事馆遭袭事件的保安工作疏漏负责，称此事与总统奥巴马和奥巴马无关。这位在美国国内人气超高、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政治强人罕见的低下了头。尽管有分析认为，希拉里在奥巴马第二场辩论前撇清总统奥巴马的责任，似乎是有意为奥巴马开脱。不过，就是希拉里有意为奥巴马开脱，亦掩盖不住美国外交东西两难的困境。

美国这种困境与作为国务卿的希拉里的性格也不无关系。美国经历了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漫长的战争，国力大为削弱，原来美国应处于暂时的战略收缩期，但希拉里仍然顽固地继续推行以不惜自我毁灭为代价、帝国过度扩张的外交政策。

美国不计代价的扩张，为避免自身的消耗，不得不把负担的责任转嫁给盟友。不过，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盟国在承担美国的部分责任，遵循美国步调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的安全、利益与发展环境的需求，对美国提出自己的需求，反过来绑架美国的对外政策，让美国进一步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10月3日，土叙边界的土耳其阿克恰卡莱遭到来自叙利亚一侧的迫击炮袭击，爆炸导致一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丧生，土耳其立即毫不客气地给予反击。作为北约盟国和美国的战略盟友，土耳其迅速得到了美国与北约“毫无犹豫地”支持。甚至土耳其出动F-16战斗机拦截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大马士革的民航客机，这种羞辱无异于“向俄罗斯脸上吐痰”，也得到了美国“强烈支持”。面对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的尴尬，土耳其方面准备把美国拉下水大打一仗，华盛顿方面真的下决心、准备好了么？

美海军接近可持续部署极限

在东亚，这项政策恐怕要在若干年后才能评估，很可能又是美国近年来另一失败的对外政策。美军近期在日本接连部署多个先进机型，包括鱼鹰运输机、F-22猛禽战斗机、F-35隐形战斗机、海神反潜侦察机和咆哮者电子战斗机。有分析认为，五大尖端战斗机齐聚日本，熟悉太平洋战场环境，是从战略层面防范和威慑中国。此外，乔治·华盛顿号与约翰·斯滕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已分别活动在中国的东海、南中国海

中国聚焦 唐文方

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增加。据清华大学某“权威社会学家”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数字，2010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共发生18万起，而据说1994年只有1万起，2004年7万起。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少则几人，多则几万、十几万人。

动辄就和政府叫板，已经不是几个异见人士或公共知识分子的事情，而是中国公众正在形成的一种时尚，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最近外电接连报道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例如乌坎村委会卖地事件、什邡铜矿事件、石首厨师坠楼事件、瓮安少女溺水事件、济南女警打人事件，等等。

中国的异见人士和西方媒体每次都都很兴奋，喜欢用“黎明前的曙光”、“民主的前奏”、“专制政权正在走向崩溃”来形容此类事件的性质。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应该越来越低。然而，近年来的各种民调，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做的，无论是希望中国好的或不希望中国好的人做的，都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支持率持续走高，这显然与“民主前奏”论不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的支持率高，是因为它成功地利用了群体性事件来提升和巩固自身的地位。

通过将群众的愤怒情绪转向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以及个别政府官员，中央或省级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解决地方问题，越过司法程序或地方机构，与民众建立直接的对话，从而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然而，这种做法鼓励民众不遵守法律，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甚至鼓励暴民心理的发泄。

中国正在回到一个大众威权主义社会，政治领袖和百姓直接联系在一起，中间没有公民社会中的所谓“缓冲地带”，如选举、司法程序，以及独立的民间组织（例如独立的工会）。

中国的法官被政府要求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在

等岛屿争议海域。在中东问题层出不穷，仍无法抽身的情况下，却高调、大幅度地重返亚太、再平衡中国！

美国在东亚的大动作，无疑是声援它在东亚的两个盟国——在钓鱼岛与中国冲突的日本和在黄岩岛与中国争端的菲律宾。美国政策实际让东亚从此再也无法安宁。由于“企业”号与“艾森豪威尔”号两个航母战斗群正部署在中东，所以美国目前有四个航母战斗群在应对危机，因此美国海军目前接近可持续部署进度的极限。挑战、围堵一个美国自身的全球利益相关者和全球伙伴——中国，美国真的耗得起么？

更迫在眉睫的是伊朗核危机。美国的中东铁杆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年多来曾多次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压，认为伊朗再过六至七个月就接近有能力打造核弹，美国必须赶紧为德黑兰当局划下“红线”，并暗示以色列可能在没有

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采取武力行动，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但奥巴马坚持还有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余地，无意对伊朗动武。以色列不仅要美国全面军事打击世仇伊朗，还在巴以和平问题上固执，丝毫不给奥巴马政府面子，美国在巴以和平问题一筹莫展，让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得不到公正的调整机会，这是中东反美和伊斯兰激进与恐怖主义的源头。为此，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间的互不信任，甚至发展到相互厌恶程度。没有人怀疑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人们将要关注的只是美国偏袒的程度，及这种被绑架的政策还要继续多久？

应该说，以色列、土耳其、日本等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盟友，对美国遏制苏联、战胜苏联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问题是，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美国与盟友已失去共同的敌人和目标，继续维持原来结盟政策的结果是美国自己的对外政策被这些盟国所绑架。这是一个看似战略扩张的进程，实际却是让美国陷入无限麻烦和无限消耗自己的自我折磨、自我制造敌人过程中，更不利于全球的战略稳定与平衡——这也是世界霸主的大忌。因此，美国对外战略急需战略性调整与转变，现在在美国抛弃不合潮流、冷战时结盟政策的时候了！或许，用全球伙伴关系取代全球结盟更符合美国的霸权与根本利益。

作者是中国公共政策与国际战略学者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倒退

露天场合召开审判会，政府常常对不服从判决的家属进行补偿，例如湖北石首酒店厨师坠楼事件和贵州瓮安少女溺水事件，家属和本地群众拒绝接受法医的非他杀尸检报告，并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上级政府的介入，并对死者家属做出补偿，不管尸检结果如何。这种做法虽然让群众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却是对正常司法程序的蔑视。

红卫兵2.0版

互联网被西方视为民主的希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组织群众，突破新闻封锁，快速传播信息，美国有人甚至要提名Twitter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然而，在中国，网民们通过人肉搜索，肆无忌惮地暴露他人隐私，倒不是说被暴露的人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这种不通过法律程序，而是通过暴民的社会运动形式来主持正义，无疑是文革的重演。一位明眼的西方记者把这种人肉搜索称为“红卫兵2.0版”。

“红卫兵2.0版”的行为也反映在江苏启东污水处理厂事件上，群众将启东市长和市委书记扒光了上衣，强迫他们穿环保T恤，后来市长和市委书记均遭到免职。

山东济南一女警察与一对修车夫妇发生冲突，民众将女警察从警车中拽出，并往她身上泼水，强迫她跪在修车夫妇面前认罪，致使女警遭到开除公职。

通过群众运动而不是司法程序来主持正义，让人想起文革中的大批判。

在这些事件中，很多时候民众都是打着中央政府的旗号抗议，如乌坎、石首，虽然暂时形成了最底层社会对最高层政权的高满意度和支持度，但是这种暴民文化却是对公民社会的践踏。

那些认为群体性事件是黎明前曙光的人们，请不要再去鼓励百姓的暴民情绪了。

作者是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政治讲座教授